

农民养老行为的实践逻辑研究

——基于 2006 年 CGSS 数据资料的分析

狄金华, 李 静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 / 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农民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构成农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农民行为发生机制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民行为本身, 同时亦有助于理解政策在农村社会的实践特征。基于 2006 年 CGSS 数据, 考察了农民养老的制度背景, 分析了农民的养老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提出“风险规避与路径选择”构成了农民养老行为的实践特征。研究发现, 农民行为的发生包括 2 个相反相成的过程, 即一方面农民行为发生场域中的结构、规范与准则对农民的行为选择具有影响和制约作用; 另一方面, 结构、规范与准则为农民行为提供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 而是一定的行为空间, 在这个既定的空间之中, 农民则通过理性算计来决定行为的选择。

关键词 农民养老行为; 选择偏好; 结构制约; 风险规避;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F 84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3)01-0096-07

当国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时, 一部分农民确实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 但亦有许多农民仍然将家庭养老作为自己的首选。如果研究者承认所有的制度设计只有合乎了受众的行为习惯才能够获得受众的认可与支持, 继而取得成功的话, 那么研究者就有必要首先去认清农民的行为(或曰行动的实践逻辑)是什么样的, 他们究竟是怎样应对养老的。本文则试图在梳理现有理论对农民行为实践逻辑研究的基础上, 考察农民自身的选择偏好与其所处社会场域对其行为的影响, 并以此为基础理解农民养老行为实践逻辑的特点。这一分析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入地了解农民养老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而且回应了社会科学对个体行为的分析命题, 形成对农民行为实践机制研究的经验积累。

一、经典的理论之争: 个体的行为何以发生

苏格拉底的一句经典名言: “人啊, 你应该认识你自己”, 预言着对人的行为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必将占据至关重要地位。社会科学确实众望所归地将个

体行为的解释列入其研究的重点,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社会科学界对于个体行为的发生机制拥有一致的看法, 相反, 在其内部就行为的发生机制存在着重大分歧。

经济学家秉承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传统, 坚信人的行为源自于其特定的兴趣偏好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理性选择, 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之中来理解与解释人们的具体行为。这构成了经济学经典的“兴趣—利益选择偏好”解释框架。在经济学的理论中, “理性”^① 成为其分析个体行为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经济学家在分析个体行为的时候, 将个体的理性考虑列为最主要, 甚至是唯一的考量因素。这一特征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得到清晰的展现, 他们强调人的利己性, 并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预设前提之一。

与经济学的解释路径不同, 传统的社会学一直认为个人的认知与行为都源自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② 与社会制度的型塑, 对此个人并没有过多的自主性选择。如, 迪尔凯姆在方法论层面清晰地阐明“社会事实能够且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

收稿日期: 2012-1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调查研究”(10ASH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研究”(08CSH03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研究”(11YJC840010);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资助项目(2010SC20)。

作者简介: 狄金华(1982-), 男,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E-mail: djinhua1982@126.com

亦即对个体的解释必须从结构层面而非个体层面的生理、心理来进行,因为真正对个体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结构的制约^[1]。

近年来,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活动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视其他学科研究的传统,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其对个体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中都开始抛弃原有单一强调“理性选择”或“结构约制”的极端路径,面对这种漫话夸张式的对比,研究者们都同意真理存在于这2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但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和研究取向^[2],则是当前研究者们仍继续努力的方向。

学科的交叉与碰撞,使研究者们日渐清晰地认识到,成功地洞察个体行为发生机制的关键是要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的之间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能力的理论架构^[2]。正是基于这种努力,新制度学派得以孕育和发展。新制度学派试图在制度决定和理性选择之间寻找平衡时,但其努力并未因自身的产生与发展而令社会科学界对个体行为机制的讨论渐趋统一,相反,仅新制度学派内部就又分歧为不同的派别。凯尔布尔将新制度学派论者划分为三大类,即理性选择制度学派论者、历史学制度学派论者和社会学制度学派论者^[3]。其中,理性选择制度学派论者更多地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认为个体及其战略预测应当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虽然他们关注制度,但他们认为制度只是一种能够影响但不能决定个体选择和行为的介入变量。与理性选择制度学派把偏好的形成排斥在分析之外不同,历史学制度学派认为偏好是由制度形成的,该学派并不否认个体试图预测其利益,但认为最终结果乃是各种群体、利益、观念和制度结构互动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制度既对个体行为起着决定性的塑造作用,但其同时又受集体和个体选择的双重影响。而社会学制度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仍延续着传统社会学结构论的观点,其认为个体决策不仅是制度背景的产物,而且是更大的参照框架的产物。对于社会学制度学派论者来说,制度本身取决于更大的“客观层次”的变量(如社会和文化之类),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无足轻重的因变量^[3]。

通过上述的简短回顾,可以发现对个体行为发生机制的探讨不仅由来已久,且已经形成若干类型化的解释范式。新制度学派在理论调合中的努力并未平息社会科学界对个体行为发生机制讨论的纷争,于是这一社会科学的经典争论又延续至今。虽

然笔者承认,纯粹的理论探讨始终无法投射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之中,但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往往会令具体的经验研究拥有更为明确的指向。

二、小农行为的发生机制之辩: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小农的行为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小农理论,并搅拌起了学术界富有盛名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虽然“斯科特—波普金争论”只是《亚洲研究杂志》中的“特殊问题”,但其所指向的小农社会研究与小农关系研究中“实质主义者学派”和“形式主义者学派”则具有更为广阔、深远的学术基础与学术传统。

实质主义者在研究小农行为时,认为小农行为是嵌入在其所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网络之中,由于“个体自利”的概念具有文化的特殊性,因而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推广。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各种风险的存在,共同体内部通过传统与规范进行整合,以谋求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实质主义者认为,若要对小农的行为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则必须考虑小农所处的社会—文化网络。因为传统与规范是最基本的社会因素,并且强有力的传统动机的制约几乎总是调整着个体行为。虽然实质主义者学派包括吉尔茨、波兰尼、E·沃尔夫等学者,但卓有成就的论述则必须提及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4]。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研究了东南亚(主要是缅甸和越南)小农的社会安排和政治行为^[4],其拓展了爱德华·汤普森对道义经济理论的分析与阐释^[5]。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詹姆斯·C·斯科特极力强调生存规则对于底层农民的道德涵义,即农民对剥削的认知并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的占有问题,而是取决于农民对社会公正、权利义务以及互利互惠关系的认知。对于长期处于“水深齐脖”状态的小农而言,生存对他们而言是第一位的,他们的行为总是将风险规避置于最为重要的位置,而不愿冒险去追求收入最大化。对于“剥削”和“公平”的认知,“道义伦理”下的小农更看重的不是“被拿走了多少”而是“剩了多少”^[4]。詹姆斯·C·斯科特虽然是以经验研究切入对小农行为发生机制的讨论,但其理论的基石却是明显而牢固的,即小农的日常行为受到共同体内的规范与准则约束,为了解释小农的行为,有必要理解共同体内的规范与准则。正是基于此,包括詹

姆斯·C·斯科特在内的实质主义者都试图建立一个“社会行动选择模型”：所有行动发生在某种有意义的选择领域之内，背景价值观与背景内涵决定了可能的领域，然后这个领域以狭隘的约束条件影响个人现有的可能性^[4]。

与实质主义者不同，形式主义者在研究小农行为系统及小农社会时，首先假定了小农是使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而为了谋求自身（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小农甚至不惜牺牲集体的规范和共同体的福利。形式主义者的研究目标就是运用这些经济分析工具（主要包括在个体物质利益基础上行动的理性计算的观点）解释非西方社会生活的特征。形式主义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舒尔茨、马若孟、Popkin 等。舒尔茨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西方社会一般人心目中所认为的“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农户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单位，小农是一个在“传统农业”（在投入现代的机械动力和化肥之前）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够作出最适度运用的人^[6]。与舒尔茨的研究相比，Popkin 的个案研究更能够体现出经验研究的社会基础。Popkin 在《The Rational Peasant》一书中通过对 19 世纪中期以后的越南农村政治与经济状况的研究，指出乡村制度并没有像道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效，小农的行为因其个体理性的支配而显得更具复杂性，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也使得共同体的规则无法有效地制约个体的行为^[7]。因此，Popkin 强调，对于小农社会以及小农行为系统的研究“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农民的个体收入动机上”^[7]。在形式主义者看来，小农行为的产生是基于小农自身的理性计算，即如何才能够实现个人福利和家庭福利的最大化。与实质主义者强调准则与价值观的规范不同，形式主义者并不认为农村制度与惯例具有结构刚性，相反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小农的行为并不为准则与价值观所钳制。形式主义者虽然包括了经济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但其却共同接受和认同了古典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计算观念，认为小农的行为最根本的是源自于自身福利的算计。

实质主义者学派与形式主义者学派之间的争论虽然只是社会理论界关于个体行为发生机制的一个翻版与再叙述，但却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小农社会以及小农的行为系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如若将实质主义者学派与形式主义者学派的观点极端

化，则发现二者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传统社会（农村社会）内部是否具有统一约制性的规范以及规范在何种程度上约制小农的行为。为了进一步推进知识的生产与积累，下文将会结合小农养老行为来对小农行为与规范之间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三、小农养老行为的实践之逻辑：行为选择与结构制约

如前文所述，不论是对个体行为发生机制的经典社会科学争论，还是实质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的“交锋”，都力图把握身处社会之中个体的行为的实践特征。就农民研究而言，要理解他们的行为则需要考察他们在社会结构与制度规范约束下的实践特征。在这一节中，笔者将以小农的养老行为为切入点，来探究小农如何在结构、规范与准则的约束下行为，以此回应前文所述的经典社会科学争论与实质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交锋”。

本文将通过对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CGSS）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农民的养老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实施，2006 年的调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 年）为抽样框，采取标准 PPS 抽样方法，共获得 6 013 个城市有效样本和 4 138 个农村有效样本，其中有 3 028 个样本回答家庭问卷。本文选取农村样本，有关样本的具体描述统计特征如下：（1）从性别上看，样本中，男性人口为 2 001 人，占 48.4%，女性人口为 2 137 人，占 51.6%，女性人口比重稍高；（2）从年龄结构看，样本中，年龄最小的 18 岁，最大的 69 岁；（3）从受教育程度看，样本中，最少接受过 1 年的教育，最多接受过 17 年教育，均值为 7.02；（4）从婚姻状况看，样本中，未婚、已婚有配偶、离婚和丧偶所对应的人数依次为 324（7.8%）、3 612（87.3%）、49（1.2%）、153（3.7%）（见表 1）。

1. 农民养老的制度背景：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超过城市。2000 年，我国农村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别为 10.9% 和 9.7%。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统计，到 2008 年，我国城市、镇和乡村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9.66%、8.77% 和 9.79%。目前农村每 8 个劳动力就要供养一个老人，而预计到 2050 年，每 2.5 个劳动力就要供养一个老年人。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需要未雨绸缪，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体系。

表1 样本的基本特征

类别	变量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2 001	48.4
	女	2 137	51.6
年龄	26岁及以下	452	10.9
	27~36岁	858	20.7
	37~46岁	1 164	28.1
	47~56岁	961	23.2
	57岁及以上	703	17.0
文化程度	6年及以下	1 515	44.7
	7~9年	1 445	42.7
	10~12年	351	10.4
	13年及以上	77	2.3
婚姻状况	未婚	324	7.8
	已婚有配偶	3 612	87.3
	离婚	49	1.2
	丧偶	153	3.7

老年保障通常指家庭或社会组织为老人提供相应的经济和服务等方面支持。从经济支持的角度讲,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老年保障先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家庭保障、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保障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多元化保障3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通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保障了基本生活。但是此一时期,虽然“五保”供养制度开始萌芽,但针对农村老人的社会保障尚未出现,非“五保”老人完全依靠家庭保障。第二阶段时,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粮食一般按“口粮加工分粮”或“工分粮加照顾”的原则分配,口粮按人口平均分配。这样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便得到了保障。除此之外,有条件的核算单位可以实行养老金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完全解体时,全国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0个乡,9 460个村实行了退休养老金制度,享受人数超过60万人^[8]。在第三阶段,农民的分散经营使得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下的集体经济基础被削弱,进而影响了集体保障农村老人福利的经济基础,农村老人的保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保障再度依赖于家庭。除此之外,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在探索中逐渐建立。回顾历史,农村老年保障长期不被重视,有关制度极不完善,且农村老年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农村老年经济保障主要依靠家庭^[9]。

2. 农民的养老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任务的绝大部分是由家庭承担,农村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赡养和土地收入。在本文中,农民的养老行为主要是指子在居住方式、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4个方

面,对年老力衰的父代进行赡养的具体实践形态。

居住方式在农村老年人保障问题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能够与子孙后代居住在一起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基本生活条件之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家庭规模逐渐的核心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现象逐渐减少。数据显示,分别有47.4%和39.2%的子女不与父亲、母亲居住在一起。另外,15.8%的子女会经常向其父母提供金钱,19.4%的子女会经常帮助父母料理家务,14.9%的子女会经常倾听父母的心事或想法(见表2)。通过数据资料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农村子女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与父母居住在一起,而且在经济和日常照料等方面也较少为父母提供帮助,更少给父母以精神慰藉。

表2 农村子女对其父母所提供的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情况					%
	很经常	经常	有时	很少	完全没有	
给钱	2.5	13.3	23.0	15.4	10.1	
帮助料理家务	3.5	15.9	20.9	16.3	8.0	
听他(们)的心事或想法	1.9	13.0	26.6	17.9	5.4	

要深入理解农民养老行为的发生机制,则有必要探析影响农民养老行为的各因素。首先,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农民会经过一个“理智过程”来作出践行何种养老行为的理性抉择。那么,农村子女在考虑是否对年老力衰的父母提供经济、生活以及情感上的帮助时,需要考虑2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是是否有足够丰富的家庭盈余;二是是否有充足闲暇的时间。因此,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本文提出以下2条假设:

假设1:家庭经济盈余对农村子女是否践行家庭养老(向父母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影响显著,且家庭经济盈余越多,子女向其父母提供家庭养老的程度越高。

假设2:子女拥有的闲暇时间也对农村子女是否践行家庭养老影响显著,且闲暇时间越充裕,子女向其父母提供家庭养老的程度越高。

另外,“结构约束”也是影响个体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根据实质主义者的研究,小农的行为受其所身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网络所制约。以反馈模式为表征的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社会中已经绵延了数千载,这种代际均衡互惠的养老模式背后有一整套的从宏观到微观的社会机制来维持它的持续运转。其中,孝道观念和家庭结构、代际关系构成了家庭养老的文化

基础和家庭基础^[10]。除此之外,国家政策的运行对家庭养老的发展发挥着推拉作用,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推行。因此,本文又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子女的孝道价值观对其是否践行家庭养老影响显著,孝道价值观越强,子女向其父母提供家庭养老的程度越高。

假设 4:家庭结构对子女是否践行家庭养老影响显著。在本文中,家庭结构主要通过兄弟姐妹数进行测量,即兄弟姐妹数越多,子女将较多向其父母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

假设 5:代际关系与子女是否践行家庭养老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越好,向父母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越频繁。

假设 6:国家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子女是否践行家庭养老存在消极影响,即子女或家庭成员享受养老保险,则子女将较少向其父母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农民的养老行为,即子女所提供的家庭养老程度,设置为因变量 Y ,将有可能影响农民养老行为的 6 个因素设置为解释变量 X_1, X_2, \dots, X_n ,其中, n 为解释变量的个数, $n=6$ 。线性模型的具体形式是: $Y = \beta_0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11} X_{11} + \epsilon$ 。在本文中,因变量是农村子女所提供的家庭养老的频繁程度,包括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的精神慰藉的频繁程度。在 2006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家庭问卷中,设计了一个测量子女提供家庭养老的频繁程度。题目的答案选项分为“很经常”“经常”“有时”“很少”和“完全没有”五类。笔者依次对这五类分别赋值 1~5,总程度变量由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

神慰藉的题目得分加总形成,将它视为连续型变量,取值区间为 3 到 15,数值越大,表明子女向其父母所提供家庭养老的程度越低。另外,本文中的自变量包括劳动时间、家庭消费一支出比、兄弟姐妹数、孝道价值观、代际关系(与父亲的关系)和是否享受养老保险。有关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 3。其中,孝道价值观是由七维度量表进行测量,并根据同意程度“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依次赋值 1~7。在问卷中所测量的条目共 6 项,总价值观念由 6 项得分加总形成,视为连续变量。

为了更好地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分别构建了 3 个线性回归模型(见表 4):模型一中自变量包括劳动时间和家庭消费一支出比;模型二中自变量分别为兄弟姐妹数、孝道价值观、代际关系以及是否享受养老保险;模型三中的自变量是模型一和模型二的汇总。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家庭养老	连续变量	9.722	2.376
自变量			
劳动时间	连续变量	323.483	98.237
全家消费/ 全家收入	连续变量	0.349	0.889
兄弟姐妹数	连续变量	2.690	1.863
孝道价值观	连续变量	15.414	3.974
代际关系	很不好 = 5(0.4%); 不好 = 4(0.5%); 无所谓 = 3(6.0%); 好 = 2(64.3%); 很好 = 1(16.9%)	4.210	0.597
是否享受 养老保险	享受 = 1(8.3%); 不享受 = 0(91.7%)	0.083	0.275

表 4 农民养老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线性回归)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水平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水平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水平
常数	9.671	0.000	11.213	0.000	11.155	0.000
劳动时间	0.000	0.714			0.000	0.652
家庭消费-支出比	0.003	0.828			0.004	0.785
兄弟姐妹数			-0.009	0.111	-0.009	0.109
孝道价值观			0.016	0.003	0.016	0.003
代际关系(与父亲的关系)			0.405	0.000	0.405	0.000
是否享受养老保险			-0.110	0.078	-0.110	0.077

从分析结果来看,在模型一和模型三中,劳动时间和家庭消费一支出比均不对农民向其父母提供家庭养老的程度构成显著性影响。因此,假设 1 和假设 2 均未得到检验。在模型二和模型三中,孝道价值观、代际关系对农民向其父母提供家庭养老的程度影响显著,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0.003 和 0.000。

其中,孝道价值观与农民的养老行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孝道价值观越强烈,子女越有可能向父母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另外,代际关系与农民的养老行为之间也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子女与父亲的关系越亲密,子女越有可能向父母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此,假设 4 和假

设5均得到检验,而假设3与假设6则没有得到检验,即兄弟姐妹数和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对农民养老行为没有显著性影响。综上所述,农民养老行为发生场域中的结构、规范与准则对农民的行为选择具有影响和制约作用,而并不是基于理性计算所作出的行为抉择。

3. 风险规避与路径选择:农民养老行为的一个解释框架

如同实质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小农行为的研究必须置于其所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网络之中进行,探讨农民的养老行为也必须考虑农民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与完善起来,且存在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低、养老金调节范围较小、管理水平低、风险大等各种问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农民养老的责任。除此之外,家庭赡养功能不断下降,土地保障也难以承担养老功能。几乎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农民日益卷入社会化体系之中,成为“社会化小农”^[1]。农民的生活日益面向市场,不仅其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以及帮工劳力)需要以货币化的方式在市场上获取,而且其生活资料,包括人情交往都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市场购买力。农民提供家庭养老能力同时也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

单个的农民进行养老行为选择时,其确实如形式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进行着“理性算计”。这种理性算计并不是简单的利益最大化考虑,也不是由个人的自利支配,他往往是在道德规范、代际关系和家庭结构等层面进行着综合的考量,甚至他们会针对国家政策而调整养老行为。农民的养老行为更多地体现着“风险规避”的特征:农民始终在缩减经济消费(支出)与减轻养老给家庭带来损失(风险)之间博弈。具体的行为选择往往是农民在博弈曲线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均衡点。

农户的“风险规避”并非个人理性算计的任意发挥,其行为实践总是在一定的规则与结构之中展开。村庄内的道德规范迫使农民不可能对年老力衰的老人置之不理,但村庄的价值观同样也不可能令子女倾其所有来进行赡养父母。农民只是在道德规范、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制度安排等约束下,在既定的空间内来实现自己的“风险规避”。

四、结 语

前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的养老行为具有明显的“风险规避”特征,农民养老行为的发生机制由2个相反相成的方面构成:一方面,农民养老行为发生场域中的结构、规范与准则对农民养老行为的选择具有影响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结构、规范与准则为农民养老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如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提供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在这个既定的空间之中,农民通过理性算计来决定养老行为的选择。这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既保障了农民养老行为在相当时空范围内具有稳定性,同时又形塑了农民养老行为的复杂性。正是因为如此,未来对农民养老行为的探讨,甚至是对整个农民行为的研究,不仅需要把握结构、规范与准则对农民行为的约束,更需要探寻农民在既定行为空间中的多样化选择以及影响其选择背后的因素。

[致谢:文中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和边燕杰教授),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而论文内容则由作者自行负责。]

参 考 文 献

- [1]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J].许德珩,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 [2] 周雪光.制度是如何思维的?[J].读书,2001(4):10-18.
- [3] [美]凯尔布尔.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J].崔树义,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6(3):2-7.
- [4]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刘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5] [英]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M].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6]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7] POPKIN S. The rational peasant[M].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78.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经济管理法规文件汇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369.
- [9] 林闽钢.现代社会保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244.
- [10] 张仕平,刘丽华.建国以来农村老年保障的历史沿革、特点及成因[J].人口学刊,2000(5):35-39.
- [11] 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J].学术月刊,2006(7):5-13.

注 释

① 最先为“理性”进行定义的是心理学家,他们更倾向于将“理性”定义为一个不同于“情感机制”的“认知过程”或“理智过程”。威廉·詹姆士曾明确地将“理性”等同于“称作推理的特定思考过程”,认为抉择的理性直接取决于抉择过程。但“理性”的非经济学定义逐渐被经济学家的定义所“覆盖”。正如西蒙所指出的那

样,“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指抉择过程的理性一词正在销声匿迹”。经济学家们更多的是用理性一词来表示通过抉择过程遴选出来的行为模式的属性,而不关注具体抉择过程的属性特征。

② “结构”原本是一个建筑学的概念,后不断拓展到工程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斯宾塞将“结构”引入社会分析之中,故有了“社会机构”的概念。由此,“结构”也由原初的形象化的概念衍变为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斯宾塞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经涂尔干直接影响到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

A Practical Study on Peasant' Aging Security Behavior

— An Analysis Based on CGSS Data of Year 2006

DI Jin-hua, LI J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The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peasant's behavior contributes substantially to the farmers study, and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cy in the rural community. Based on CGSS data, the article examin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farmers aging security system, and analyzed farmers' behavior and factors when they make their aging security choices. It put forward that “risk averse” and “path selection” constituting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aging security behavior. The study found that farmers behavior occurred, including two opposite and complementary process, that is, on the one hand the register where farmers' behavior occurs, from the point of its structure, norms and guidelines, has great influence on farmers' behavior and sel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ucture, norms and guidelines are not the specific pattern of peasant's behavior. Instead, it is a behavior space, where peasants establish and make their decision through rational calculation.

Key words peasants' aging security behavior; choice preferenc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risk averse; path selection

(责任编辑:刘少雷)